

永川县志编辑部
(十四)



10/89 14 精神中子创建史略

陈博一

1 118

15.16
铁 (14) (17)

永 川 县 文 史 资 料

(十 五)

四川省永川县委员会文史组编

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

永川柏林碗厂简史

庄长发、唐炳坤口述

一、厂的由来

柏林碗厂位于永川南面的石笋山下，从成渝铁路柏林车站向下行不过一华里，即可至厂所在地。该厂在清代康熙年间由董秀武创办。传至三世董伦玉弟兄经办时，命名为“三元和”碗厂，并在松溉镇开设“三元和”碗铺。民国改为“三元泰”碗厂，解放后则改为“复兴办和”碗厂，现为柏林碗厂，属全民所有，为永川县办企业之一。

年逾五旬的老人董修若说，这原是我们董家的“子孙厂”。事实正是这样，解放前一直为董姓独家经营，解放后始有外姓投资。据董氏家谱记载：“高祖绍生公讳秀武……生平不仅以小技见长，康熙丙子，公年四十有一，家系永昌和皮原居，迁于永川县南太平乡（按：据县志记载：清顺治十一年全县编为三乡一里，永昌乡、永善乡、太平乡、安贤里。康熙年间，湖广、江西、福建等省大量移民永四川，人口增加，全县改划为六乡一里：老永昌、老永善、老太平、新永昌、新永善、新太平。安贤里。据此，这里应是新太平。）石笋山下向家滩董子边老屋基，筑成做店。”由此可见该厂距今已二百余年的历史了。

该厂曾一度繁荣兴旺，在入传三世董伦玉弟兄经办时，即为其极

≈ 1 ≈

盛时期。据董氏家谱载景臣公（入蜀二世）行署……英津邑花园龙井
屋基与柏林数处田业，约谷千余亩。迄今子孙所享者，皆公戮力所创
也……。”又附载伦玉手抄谱记“……以上弟兄叔侄所买各处田业房
屋，不下数万金。其艰难辛苦，大费唇舌，不言可知也……”。解
放前，柏林董姓，历为望族，田连阡陌，置甲一方。解放后，多为地
主。

二、原料及销路

制碗的原料是碗泥。碗泥系采选石笋山麓特种（不软不硬）鸟
砂石，用水冲碎成细沫（水冲轮转压杆捣石反复成沫），然后拌水
搅匀，浮面砂浆（沉砂抛弃现作玻璃原料）转入其他池内，待沉泥
干后即成碗泥。碗釉于过去用石灰和石灰，按比例拌匀，画碗原料
是气化釉，烧碗则用松栎木柴。

碗，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，所以销路很广。柏林产品。
由于历史悠久，技术精良，质量优美，畅销于省内外。如内江、泸州、
嘉定、什邡、峨眉、资中、彭县等地，每年各地年节行庄（指商家）
很多都预先定购，提前付款，然后付货。由柏林厂用人力挑运至松茂
镇，堆放在“三元和”碗铺，再乘木船运往各处，沿江溯上，远则数
月，始达其地。

三、生产情况

传说最初是做三个车子（指手工做碗的木车盘由一人操作的工具）。

在 教 造 时 期，扩大为十二个车子，职工近百人。规定定额，每天每个车子做大碗（即品碗）二十个，每个24个，计480个；做三碗（即斗碗）10个，每个36个，计360个；做三碗（六三碗）8个，每个51个，计408个；做四碗（饭碗）8个，每个57个，计456个；做五碗（茶杯）10个，每个60个，计600个；做六碗（酒杯）12个，每个60个，计720个；做五寸碟子10个，每个57个，计570个；做三寸碟子10个，每个80个，计800个；做鱼钵20个，每个8个，计160个；做调羹2板，每板1000个，计2000个。也做茶壶、酒罐、菜坛、气皿、香炉、烛台、痰皿、礼钵、盥洗等，品种繁多，不胜枚举。

烧窑每三天一窑或五天一窑，办碗泥、劈木柴。画花上釉、装窑出窑，每天每人应做多少，均各有陈规，无庸赘述。

四、工人待遇和组织

过去在封建地主经营时，以剥削为主，剥削甚多，而工人所得仍寥寥无几。伙食由厂供给。一般收入，多者只能维持二、三人生活，少者聊可自给自足，甚至衣不蔽体，日食难度者无不乏其人。

相传从前有个做碗姓樊的能工巧匠，后来人尊他为樊公菩萨，做碗的人都顶敬他，于是成立了“樊公会”，会址设在江岸六合场。会金由生徒王一次捐献，金额约值人民币五十元。石笋三二郎山一带，江、永两地碗厂，共有十余家。每厂选工人代表一名，在代表中再选

总代表一名。代表，总代表，皆不脱产。凡遇工人提升工价和福利，以及与厂方纠纷等，则由“契公会”出面协调。解放前抗日时期，货币贬值，物价狂涨，朝夕数变，工人无法维生。总代表李树廷，因江津郭家坝沙坝碗厂，工人要求提价罢工，厂方封死把头，从云勾结吴石市乡公所派兵镇压，激起公愤。总代表通知各厂，曾一度停产罢工。厂方恐停产损失过大，终于得到圆满解决。这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最明显最尖锐的一场阶级斗争。

五、解放前管理概况

“三元泰”碗厂，由三大房十股组成，计有董炳恒、董树康、董冷宗、董克贵、董树荣、董继奎、董廷章、董子贤、董钧儒、唐计余（董氏外孙）等十人。厂方负责人经理董炳恒（兼），会计董树康。管窑唐计余负责买柴山和卖碗，办伙食唐炳轩，工地安排吴春廷，泥巴头高清云，劈柴头陈炳银，画碗董清臣，车底、上釉、打浆等，均各有专人。全厂职工约百名。除会计、管窑二人外，其余分工跟班劳动，各司其事，各尽其责，一环扣一环，井井有条。超额有奖，不称职者解雇，颇似现在的厂长责任制。管理人员有职有权，能发挥所长。

六、“复兴协和”碗厂的由来与发起人王长友

1949年正是大西南解放之际，既是永川人民重见曙光之时，也是柏林碗厂工人幸福将临之日。这年冬天，国内形势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。碗厂的工人们，都兴高采烈地回家过新年，全厂热烈停

紧接着就是征耕和土产加征、减租退押、清匪反霸等轰轰烈烈的运动。

产。在那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中，由于厂里的股东和负责人，都是封建地主全属斗争对象。因而企业无人领导，^{过问，以致长期}生产停顿，亦无人倡议恢复。原碗厂工人而又未分田的曾采芹、徐兴仁、阳玉清、陈久林等24户，百多人口，生活面临困难，无法解决。厂里资财也无人过问，眼看该厂将要遭到损失和破坏。爱国人士庄长发见此情景，经过考虑，遂把柏林、劫子山两厂的工人们聚集拢来，开过小组，商量打“弟兄班”不分领导，工人，报酬一骨，恢复生产，合伙求财。一致推选庄长发为经理，该厂集资入股，更名为“复兴协和”碗厂。每股投资黄金四石或折股金四十元。计有庄长发、严利高、严树云、董树廷、董庆忠、董竹修、董中华、蔡作鹏、阳玉清、阳体辉、陈久林、徐兴仁、蒋心田、蒋心亮、蒋树江等共计十五股半。五〇年秋收后，全厂有五十多人，正式开始生产。由于当时封建残余势力，尚未彻底清除，社会秩序，十分混乱，因此时届半年，毫无销路，产品滞销积压。在此情况下，通过众议，职工仅给伙食，暂停工资。庄经理和全厂职工同心协力，刻苦耐劳，终于在五二年打开僵局，产品畅销，运至内江、富顺、成都、广汉等地。由于生产发展，收入增多，重新补发了工资，最多者月得六七十元。全厂职工也增至百人左右。一九五六年实行公私合营，县派李光成为公方代表，庄长发为资方代表。庄长发先后当选为第二届至第八届永川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这充分表明，一个人只要能为人民做好事，且半途而废，人民总是不会忘记他的。

文字修整：戴俊杰

永 川 县 文 史 资 料

(十 六)

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组编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日

我们对“陆军教导总队”的回忆

刘湘是四川军阀中的首脑人物。清末刘自四川军官速成学堂毕业后，分发四川新军十七镇见习，后任排官，队官。辛亥革命后，十七镇改为川军第一师，刘湘在师长周骏提拔下，升为营长、团长；护国之战，周骏以拥袁下台，周道刚继任，刘湘升任该师旅长。后周辞职，刘湘代理师长。1918年，四川督军熊克武改编川军，以刘湘为川军第二师师长。自此以后，刘湘乃跻身四川军队一个独立系统的首领之列。历任川军第二军军长，四川善后督办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，四川省主席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等职，声望逐渐提高，实力逐渐扩大。刘湘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先后办了合川传习所（川军把它叫做“传帮”），重庆镇守使军官学校（老二十一年习称为“军官生”），广元坝军官教育团。一九三六年五月，刘湘在成都又开办了川康绥靖公署陆军教导总队（以下简称“教总队”），也是刘湘一生中创办军事学校最后的一次。我们是该总队的学员，从开始到毕业。现就记忆所及，将亲历亲见亲闻的有关活动，把它记述出来，以供参考。

教总队的开办及其学员（生）的来源

蒋介石多年以来，图谋四川，控制西南，而苦无机会。一九三五

年一月，蒋借堵截红军为名，继所谓参谋团、别动队和宪兵入川之后，先后开办了峨山军官训练团和成都分校。总之蒋介石使用包括各牌特务在内的各种力量，从各方面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分化刘湘的军队，侵占刘湘的地盘，必欲吞并和消灭刘湘而后已。

刘湘面对蒋介石大挖其墙脚的这些恶毒手法，心实不甘，感到如果不立即采取对策，自己“惨淡经营”多年的统治地位，势必岌岌可危。于是在他的所谓“智囊团”张斯可、钟体乾、付翼吾、邓汉祥、程祖佑、乔毅夫、陈学池、刘航琛等“谋士”的精心策划下，除了加强内部统治防止蒋的渗透之外，遂决心每月支付十二万元的巨款开办教总队。

关于学员（生）的来源。刘湘既已爬上川康绥靖主任的宝座，而教总队的牌子又冠有“川康”二字，受训的对象，当然不仅限于自己直辖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和军士，还要包括四川的杨森二十军，邓锡侯二十八军，孙震四十一军，李家钰边防军和西康刘文辉二十四军的范围，并借以显示他真正是“川康王”而又能号令统一。因此之故，教总队第一大队的学员，由川康各军部队中的现役排连级选拔而来（不再考试）。第三大队是在各地招考的中学毕业生。我们第二大队同样是在川康各军部队中的军士级照规定名额保送，年龄限于二十至二十四岁，必须身体健康，毫无宿疾，身高、体重适度，经体检合格后，方准参加入学考试。试题包括典范、令和数学、物理、历史以及政治。

作文等。笔试之外还有口试。总之，必须体格、学科考试都能及格者，方予录取，否则仍送回原部队。我们幸而榜上有名，编入二大队六中队受训。我在教总队受训的，还有刘黎、唐昭德、凌承本、凌承斋、凌仿、周朝祿（地下党员）、王汝南、万迪先等人。

组织和教育

总队部组织较大，人员众多。其组织当时只知道有教育、宣传、总务、军训、军需各处和政治部。先后任总队长的为杨芳毓、袁筱如，先后任教育长的为李御（又名李御良曾任刘湘派驻冯玉祥处的代表）、刘光瑞至于处、部的负责人，我们都忘记了。

总队编制：总队下分三个大队，每大队（相当于一个营）辖四个中队，每中队（相当于一个连约120人），辖三个分队（相当于一个排）。我们从编制和后来的军事教育看，全系以日本陆军建制和陆军规范训练为依据。

大队长都是少将级。第一大队大队长赵睿澍（云南讲武堂毕业），第二大队大队长宋相臣（陆军大学毕业），第三大队大队长陈南平（陆军大学毕业）。中分队长多是校级，他们的出身，不是“传帮”，便是军官生。由此不难看出，反正与刘湘有师生关系的，方能担任这样的职务。

关于学校的教育，在内容上三个大队不尽相同。这里，仅把我们第二大队的情况介绍如下：

学制原订两年，嗣因抗日战争爆发，提前毕业。从时间上说，第一大队为一年，二、三大队为一年半（1936年5月至1937年11月。）

第一学期主要是学文科教育，本科仅限于制式教练。学科有数、理、化、史、地、政治、国文等。教员大多是大學生、留學生，也有知名學者。周良材教數學，戴（忘其名。据说他在美国留学时因开机器不慎把左手大、中、无名指轧断了，由此同学们背地叫他“戴抓抓”）教物理，邱容教化学，章熙教地理，伍剑朴教历史，汪导余、李荫枫教政治，殷季如教国文。这些教员都富有教学经验，而又能循循善诱。国文教员殷季如教我们的时间虽只一学期，但效果较好。记得他选讲了诸葛亮的前后《出师表》，岳飞《五岳祠盟记》，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以及外国文学中的《柏林之围》、《最后一课》等作品。如他讲法国都德所著的《最后一课》时，能把韩麦尔先生这一主要人物的形象和作品的精妙所在，用朴素而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。我们知道殷老师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，是有鉴于日寇自掠夺东北得逞后，经常在天津等地滋事骚乱，华北局势，日趋紧张。因此，他希望通过学习，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，一旦国家有事，咸能奋勇杀敌，义无反顾！由此可见，殷老师对学生，可谓用心良苦啊！

教数学的周良材，在教代数时，他对练习题，先在黑板上演算，叫同学们照抄下来，并告诉大家下课后要好好复习，有时还指定同学

在黑板上试算。他对布置的作业，不但认真批改，而且有时在晚上还亲到自习室加以辅导。

值得提到的是，教我们政治课的汪导余、李荫枫（系刘湘清爱国将领冯玉祥推荐的，刘聘为顾问，专门帮助搞政治训练工作。他们原是冯在北平办的《民报》报社的编辑，于1940年在成都被“中统”特务抓捕）两位老师，他们学识渊博、思想进步、作风正派。而又是爱护青年的学者。政治课从开始讲到毕业，一直是两位老师教。他们西装革履，风度雍容，不仅能放下架子，与同学们打球、聊天，还经常讲述爱国和处世立身之道，语多切切，同学们都拳拳服膺。在课堂上，当讲到国际形势、世界大事时，他们慷慨激昂地列举中国积弱之由，与夫应用什么救济之道，侃侃而谈，藉以灌输我们的民族意识，增强爱国观念。特别是汪导余老师在谈到国家大事非常起劲时，还运用极微妙、极幽默的比喻，引得满堂大笑，他自己也十分高兴。同学中不少人争购阅读车^雅先同志主办的《大声周刊》（后改为《大生周刊》），都是得自汪、李两位老师宣传之力。当时课外读物，比较自由，记得教导队对我们没有什么禁令。他们还鼓励我们多给《校刊》和武德学友会主办的《武德半月刊》杂志（西安事变后，此刊在宣传“枪口对外”的内容更有分量了）写稿。同学中，写稿最多的有黄成良、蒲远怀、张烈生、周英（后在陕北抗大毕业）、谷实逊、王侠夫（谷、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晚上被中统特务周迅予、罗意开杀害于成都

西门外十二桥附近防空壕内，同时被杀害的有三十余人。见《文摘周报》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四版《临解放时敌人丧心病狂的大屠杀》。李子伯（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前夕被中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。现在三层楼上还有李的遗像及其生平事迹）等。我们也投过稿，也发表过。

第一期过去了，学校的教育项目除政治外，结束了其它学科，增加了战术、兵器、地形、筑城四大教程。教官中有陆大学生、日本士官生，还有武备生。多数有真才实学，个别是卖“牌子”，吃“资格”饭的。如教我们战术的苏子文，据说他曾在速成学堂当过教官，自然是刘湘的老师了。此人中等身材，因有隻腿带残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戴上老花眼镜，老绷着一副哭丧的脸。有时身着华达呢制服，有时长袍马褂。精神不阴不阳，讲话装腔作势，端着一副老资格的架子。由于他不学无术，上课时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，在摆他过去的经历，天南地北，乱扯一通，由此，有的人在打瞌睡。有一件最笑话的事：有一次上课时，苏子文老师突然去到一位同学位置挤着坐下来，这位同学被惊动后，睡眼惺忪地一看，见是苏老师，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。苏问：“你在招呼我吗？”“我没有说话呀！”苏说：“你不是在点头，来呀，来呀！”苏老师偏着头，两只眼睛从老花眼镜的边缘上斜视出来，用这样的腔调形容那打瞌睡的同学。那同学不消说是把头垂着，就像风中的向日葵似地东偏西倒，前颠后拐的。苏又这样形容着。

满堂的人便哄然大笑起来。但此后大家对苏更加厌恶了。只要他来上课。同学们抱着你“姑妄言之”我“姑妄听之”的态度。大约两个月后。始另由一位姓任（忘其名。日本士官生。抗战时在安徽省青阳县光荣牺牲）的教官给我们讲战术。相比之下。比苏高明多了。很受同学欢迎。

军事训练。包括制式。射击。重兵器技术等教练和野外演习等。野外演习。分为战斗。夜间演习。时间是星期三。六；地点大多在茶店子。保和场。南台寺等地。有关制式。射击教练。同学们只携带机步枪。八二五迫击炮；而野外演习。常行军。急行军。强行军还得背着被子。其下端还有一只装着二十斤鹅卵石的麻袋（经常抽查。记得有两位同学弄虚作假。曾被开除）的竹背夹。对此。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：“六月里来炎热天，身背顽石叫可怜，队长深知学生苦，昼难解痛夜难眠！”

教总队没有什么校歌。仅由政治部政工人员教唱革命歌曲。每当野外演习。实弹射击和实地测绘。往返路经市区街道。同学们引吭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开路先锋》、《大路歌》等歌曲。

此外。还有拳术。劈刺。单刀和单杠。双杠。木马。吊竿等项目。教官各有擅长。均能作精彩的示范。我们来自部队。原有一点基本功。对此。我们更感兴趣。每天黎明即起进行练习。我们现在年已七旬。

仍然腰背挺直，没有一点龙钟老态之象，不能不归结于当时能持之以恒的锻炼之功。

环境及生活

教总队所在地，是利用成都包家巷陆军医院旧址。房舍一律是灰砖楼房，洋式。这在当时来说，还不失为一个整整齐齐的建筑物。门前有几位“绥署”宪兵荷枪实弹，屹立守卫。进门不远的右侧，有一个可容一千多人的大礼堂。前楼是总队本部的办公大楼，后面几幢是学员（生）的教室、寝室、储藏室、武器库以及各中队部的住房。一些寝室、教室外面，有樟树、楠木，高入云霄，枝繁叶茂，夏秋之间，凉爽宜人。制式教练在总队附近不远的两较场。

学习期间，以我们二大队来说，原部队不再发饷了，由总队每月发津贴费十五元（交伙食费）。其他如被服、鞋袜、讲义等统由总部发给。

作息时间随季节调整。早上起床后，各自到盥洗室洗面漱口。早餐稀饭不定量，馒头每人二个，佐以炒菜或咸菜，午饭、晚饭，三菜一汤，每周两个牙祭。开饭号音响了，全中队集合鱼贯进入饭厅，就座后听哨音开始。吃饭时间，不象部队那样仓促，可以从容就食，然后再集合散队。

上课时，同学们拿着讲义和笔（大多用毛笔当时民生钢笔还不多）到教室细心听讲。每周除制式教练、野外演习外，其余上下午都有课。

晚上大家都重视自习（如因野外演习，当晚不自习）因为第二天要交作业或提问。

教总队的队规较严。如果同学违犯了，要按所谓的“陆军惩罚令”处理，视其情节轻重，分别给以轻、重禁闭。轻禁闭无所谓，重禁闭的被罚者，不得出操、上课，晚上就睡眠在一间暗室里，热天晚间蚊声如雷，数九天气寒风刺骨，使人受不了。还有所谓“禁足”（放假不得出校门），罚持枪跑步。记得第三大队不知哪些同学，为一件什么“大事”，触犯了队规，弄得全大队同学全副武装从包家巷到距成都四十里的新都，去时是持枪跑步，返回是急行军。无怪一、二大队同学们对此忿忿不平而提出这是法西斯教育的抗议。

大川饭店事件和西安事变在教总队的反应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寇加紧侵略我国，蒋介石则坚持妥协退让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。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，成都发生了“大川饭店事件”。

大川饭店在驷马市街。八月下旬蒋政府秘密将田中、濑户、度边和深川等四个日本人安排住在饭店的高级房间，准备让他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。谁知这一秘密勾结终于为人侦知，激于义愤的群众（传说不一，有的说是群众自发行动，有的说是地下党组织的反日行动，还有的说是刘湘支使的反蒋行动）便由四面八方汇集到大川饭店，人声鼎沸，个个喊打！度边和深川，经不住拳打脚踢，双双呜呼哀哉！另